

陸上行舟

史明口述史 三

史明口述史
訪談小組 著

陸上行舟

一九七五 | 二〇一〇

目次

序文	呈現過去的聲音 曾士榮	6
章·十五	路線轉換與盧修一事件	10
章·十六	日本之外，「獨」家記憶	24
章·十七	《美巖島週報》始末	40
章·十八	世界巡禮	52
章·十九	返回台灣與獨台會案	72
章·二十	獨立台灣會在台灣	84
章·二十一	返台見聞錄	106
〈解說〉	啟示與召喚：《台灣人四百年史》的思想史定位 吳叔人	126
〈解說〉	先成為人，再成為台灣人 許維德	146
本書源起	行動的起點 藍士博	176

〈解說〉

先成為人，再成為台灣人

許維德 交大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台灣民族主義

這是咱的祖先

反紅毛，反唐山，反四腳

付出流血流汗

建立起來傳統的精神

咱得繼承

先人的腳步，建立獨立國

發展國民經濟，固有文化

子孫才有前途

台灣民族主義

—— 史明

翻讀完《史明口述史》的書稿，在YouTube上聆聽著史明老先生親自演唱的〈台灣民族主義〉這首歌，整個思緒，就跌入了一九九〇年代中期美國紐約上州(Uprstate New York)漫天風雪的天氣裡，也慢慢從記憶中挖掘出我與這首歌曲曾經的私密關係。那時候，我還是一個以美國台灣運動當作論文主題的社會學博士生，因緣際會剛好買到老先生《永遠的革命者》這卷錄音帶（不是mp3，也不是CD，雖然那時候錄音帶已經逐漸被CD所取代）。也因此，有好長一段時間，只要一坐上我那輛代步車，已經留在卡匣內好一段時間的這卷錄音帶就會開始自動播放，整個空間於是響起老先生抖擻且堅毅的聲音。特別是這首〈台灣民族主義〉，我一定會跟著哼唱，邊唱邊想起太平洋邊的故鄉，想起這個島嶼多舛的命運，也想起眾多在海外為她打拼的先賢前輩……。

在擁有這卷錄音帶以前，我只有在北美洲「台灣學生社」的冬令營裡遇到過老先生一次（他是受邀的課程講師），但是，精神上卻覺得好像已經跟他很熟悉了。那次邂逅以前，在一九九〇年三月台大社會系學會所主辦的書展上，我買過老先生最重要的著作《台灣人

四百年史》(鄭南榕所翻印的「平裝普及版」,不過,書籍背後所標示的出版日期是一九八〇年,出版地則是美國聖荷西);在一九九一年五月的「獨台會」案件中,我因為參與抗議活動而差點被中正廟的警察架入警車當中,也曾經和數百個學生一起佔據台北火車站進行靜坐。一九九一年七月出國讀書,《台灣人四百年史》是跟著我上飛機的少數幾本書籍之一。之後幾年,又數度在美國不同校園的東亞圖書館中,因為發現到手寫印刷版的《獨立台灣》、《台灣大眾》等刊物(兩者都由「獨立台灣會」所發行)而如獲至寶,最終慢慢萌生出以台獨運動當作博士論文主題的發想。

然而,雖然老先生是這樣一個在台獨運動扮演關鍵角色的重要參與者,而且除了《台灣人四百年史》¹之外,他也陸續出版過不少其他論述性書籍,比如說《台灣獨立的理論與實際》、²《民族形成與台灣民族》、³《台灣民族革命與社會主義》、⁴《台灣民族主義與台灣獨立革命》、⁵《民主主義》⁶等,但是,和他生命史有關的傳記資料,相對來講就嫌不足。截至目前為止,屬於這一範疇的書籍有三本——葉博文所編輯的《荒野孤燈:史明》、⁷蘇振明的《衝突與挑戰:史明生命故事》、⁸以及史明自己所寫的《穿越紅色浪潮:史明的中國革命歷程與台灣獨立之路》⁹。然而,如果說我們真的想要深入理解老先生之生命史——特別是他為什麼會跑去中國參與中國共產黨的抗日運動、為什麼會在

中國革命成功後反而決定逃回台灣、又為什麼會在最後亡命日本從事台獨運動——的話,這三本書籍所提供的訊息顯然還不夠豐富,恐怕也無法比較完整地回答這些問題。也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下,這三冊《史明口述史》的出版,在史明研究上絕對有其相當的意義。

1 這本書至少有二種語言、七個不同的版本(未將同一出版社在不同年份的重印版本計入),包括三個日文版,見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秘あられた殖民地解放の一斷面》(東京:音羽書房,一九六二);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秘あられた殖民地解放の一斷面》(東京:新泉社,一九七四,增補改訂版);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秘あられた殖民地解放の一斷面》(台北:鴻儒堂,二〇〇五,台灣再版);兩個漢文版,見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San Jose, Calif.: 蓬島文化公司,一九八〇,平裝普及版);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台北:草根,一九九八);一個中文漫畫版,見史明繪,著,《漫畫台灣人四百年史》(台北:草根,一九九四);與一個英文版,見 Bing Su, *Taiwan's 400 Year History: The Origins and Continuing Development of the Taiwanese Society and People*, translated by Kuo-tsi Tai (Washington, D.C.: Taiwanese Cultural Grassroots Association, 1986)。

2 史明,《台灣獨立的理論與實際》(高雄:南冠,一九八八)。

3 史明,《民族形成與台灣民族》(東京: Taiwanese Cultural Grassroots [sic] Association, 1992)。

4 史明,《台灣民族革命與社會主義》(東京: Taiwanese Cultural Grassroots Association, 1993)。

5 史明,《台灣民族主義與台灣獨立革命》(台北:前衛,二〇〇一)。

6 史明,《民主主義》(台北縣新莊市:黃敏紅,二〇〇七)。

7 葉博文編,《荒野孤燈:史明》(台北:史明教育基金會,二〇〇一)。

8 蘇振明,《衝突與挑戰:史明生命故事》(台北:草根文化,二〇一一)。

9 史明,《穿越紅色浪潮:史明的中國革命歷程與台灣獨立之路》(台北:台灣教授協會,二〇一〇)。

在出版市場上，傳記這種文類一直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¹⁰ 就算是以所謂「台灣人意識」當作書寫主軸的傳記，也都已經累積到了一定程度的數量。¹¹ 在這些台灣人傳記中，許曹德之回憶錄的「坦誠」，特別是他對自己與「哈路」之纏綿畸戀、以及與「女王」之曲折姻緣的描述，最讓我印象深刻。¹² 而前調查局第一處副處長李世傑關於「台灣共和國」大總統廖文毅的書籍，特別是內文中對特務機關對該組織之滲透的敘述，可以算是一本有十足「爆點」的傳記。¹³ 此外，彭明敏的回憶錄，特別是從台灣逃亡到瑞典這段過程的書寫，則值得以「驚心動魄」這樣的字眼來形容。¹⁴ 然而，在讀完史明這本口述史以後，我卻深深覺得，不論是上述的「坦誠」、「爆點」、還是「驚心動魄」，都可以輕易在這本傳記中找到蹤影。

首先，「老實面對自己」，這雖然是任何傳記要成為「好傳記」的先決條件，但是，我卻必須說，多數的傳記（包括台灣人傳記）在這點上是不合格的。然而，老先生這本傳記，卻可以從以下這些線索中窺知其對「坦誠」這個標準的投入。比如說，在談到其家人時，老先生用「全然的封建思想」（第一章）來形容他的母親。至於史明的父親，雖然可以算是當時台

灣社會的新知識分子，但由於沉溺酒家，所以老先生就用「另一方面也是相當荒唐啦！」（第二章）這樣的字眼來描述其父親。再者，史明也幾乎完全不避諱他自己在情慾生活上的沉浮，不但談到早稻田生涯時的買春經驗（第三章）；在上海擔任中共情報人員時的紙醉金迷，「跟

10 在一九四五年到二〇〇二年之間，台灣總共出版了6,107本和傳記有關的圖書，約佔所有圖書出版品的1.09%，見李靜宜，〈台灣傳記圖書類型及其發展〉（嘉義縣大林鎮：南華大學出版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二〇〇三）。

11 我的博士論文是以美國台灣運動參與者的傳記當作主要的分析資料，在資料收集的過程中，我總共收集到和二十二個此一運動之參與者有關的二十六本傳記，見 Weider Shu, "Transform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Diaspora: An Identity Formation Approach to Biographies of Activists Affiliated with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yracuse University, Syracuse, N.Y., 2005), pp. 138-40. 但是，上述數值並未將美國以外的台灣運動參與者的傳記計算在內。近年來，也有不少重要的傳記或口述史系列叢書，其主軸就是放在具「台灣人意識」的台灣人傳記上，比較重要的包括「前衛出版社」的「台灣口述歷史叢書」，比如說高玉樹口述，《高玉樹回憶錄：玉樹臨風步步高》，林忠勝撰述，吳君瑩紀錄（台北：前衛，二〇〇七）；「望春風出版社」的「望春風傳記叢刊」，比如說張四平，《亂春風：張四平回憶錄》（台北：望春風，二〇一〇）；民進黨執政時期「國史館」所出版的「口述歷史叢書」，比如說江鵬堅口述，《勇者的身影：江鵬堅先生行誼訪談錄》，張世瑛訪問紀錄（台北縣新店市：國史館，二〇〇四）；以及「吳三連史料基金會」的「青春·逐夢·台灣國系列」叢書，比如說黃昭堂口述，《建國舵手：黃昭堂》，張炎憲、陳美蓉採訪整理（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二〇一〇）。

12 許曹德，《許曹德回憶錄：一個台灣人的成長史》（台北：前衛，一九九〇，增訂版）。

13 李世傑，《台灣共和國大總統廖文毅投降始末》（台北：自由時代，一九八八）。

14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Irvine, Calif.: 台灣出版社，一九八四）。

他們（日本軍人和文職人員）到處去玩，去到哪就喝酒、去到哪就跳舞」（第四章）；也提到自己在上海時期因為與組織指派的偽裝妻子阿雲發生關係而決定去結紮的故事（第四章）。最後，他也清楚交代自己與日本人平賀協子的關係，說明他們在北京經由跳舞而認識、同居的經過，也說明兩人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因為台獨運動的緣故而終告分手的過程（第五章）。

第二，口述史的重要價值之一，就在於讓之前的史料所未曾描述過的「史實」得以現身。老先生的生命史涉及很多重要的歷史事件，而這本傳記中對很多相關事件的「爆點」描述，至少在目前為止，恐怕也堪稱絕無僅有。比如說，在第四章中，老先生對其蘇、滬時期的情報員生涯，就有相當細緻的敘述，不但具體談到中共地下組織的運作情況，也談到不少戰後曾經引領風騷的「半山」台灣人，像是李友邦（李肇基）和吳克泰（詹世平）。再者，在第十章關於日本台獨運動組織的敘述中，老先生除了談到其與「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台灣公會」、與「台灣獨立戰線」等台獨組織的接觸情況，也對「台灣青年社」（前身為「蓬萊會」，後來先後改名為「台灣青年會」、「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台灣獨立聯盟日本本部」、「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的一些內幕，特別是王育德與黃昭堂、許世楷之間曾經的分裂事件，提供了一些說明。忝為海外台獨運動研究圈的一員，我在閱讀這本傳記以前，卻從來沒有聽聞過這些訊息。

第三，即使具備「坦誠」和「爆點」，如果傳主本人的生命史不夠精采的話，恐怕也很難寫出一本有趣的傳記。然而，在讀完老先生的口述史以後，我深深覺得，老先生的生命史是個多采多姿的「傳奇」，在我所讀過的眾多台獨運動參與者傳記中，其「驚心動魄」的程度恐怕無人能出其右。就以老先生幾次重要的「國界進出」經驗為例，他在一九三六年台北一中四年級的時候，由於害怕母親逼他去讀醫專當醫生，所以，當時十八歲的他「在一時衝動下突然決定偷偷一個人到日本讀書」（第三章）。一九四九年，老先生與平賀一起搭船從青島逃回台灣，由於抵台時沒有入境證，遂從船上朝堆滿布袋的岩壁那兒跳，才得以回到士林家中（第七章）。

一九五一年年底，由於組織「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的消息走漏，老先生開始展開全島大逃亡，一直到一九五二年五月，才以躲在貨船艙底之香蕉簍裡面的方式，伺機偷渡到日本去，雖然在上岸當天就不幸被捕（第八章、第九章）。一九六七年六月，老先生組織了「獨立台灣會」，同年八月，顏尹謨等同志在台被捕，老先生遂於一九六八年八月偷渡回台。他先是搭日本人的船從與那國島出發到釣魚台，然後又在該島等了兩、三天後，才由台灣來的小漁船送入台灣（第十四章）。一九七五年二月，由於惦念一九七四年被槍決的同志鄭評，老先生再一次經由釣魚台偷渡回台，「從瑞芳到宜蘭之間人煙較少的海岸線登陸」（第

十五章)。這樣的經歷，真的只能以「驚心動魄」這四個字來加以形容了。

從生命史追溯政治價值與民族認同的形成

不過，這本傳記最重要的價值，並不在於上述「驚心動魄」之故事的呈現，而在於其解答所謂「史明學」¹⁵兩個最基本問題——史明政治價值與民族認同之形成過程——的可能潛力。做為戰後「台獨左派」最重要的運動參與者與論述生產者，老先生留下兩個所有台灣人都必須深思的問題——他為什麼會抱持社會主義的觀點？他又為什麼會高舉「台灣民族主義」的旗幟，並義無反顧地投入台獨運動的行列？

某種解答這兩個發問的方式，就是從「思想史」的角度著手，並探究其思想形成的軌跡與脈絡，這也是之前多數的史明研究所採取的路徑。比如說，吳明勇以「台灣民族論」為核心問題意識的碩士論文，就是從「台灣史學史」的角度出發，試著去論證「台灣民族論」為「台灣史學」之發展的重要理論條件，並以老先生的著作當作主要分析素材，探討「台灣民族論」這一特定論述的形成緣由。¹⁶徐致鈞以史明之「馬克思主義民族觀」為主題的碩士論文，則是把問題意識扣緊在「階級」與「民族」這兩個概念之關係上面，並以史明

的民族論述當成討論的核心材料。¹⁷此外，吳叡人則從「思想史」的角度，試著以日文初版和漢文版之《台灣人四百年史》當作分析文本，藉此推敲老先生在不同生命階段的思想轉折。¹⁸

然而，由於欠缺比較詳實的傳記資料，上述文獻在回答這兩個問題的時候，不免有一「欠脈絡化」的問題，無法將史明的理念放到其生命史的脈絡下來理解。因此，在以下的討論中，我將以這本傳記中的相關事件當作主要的分析材料，試著去理解史明為什麼會成為一個「社會主義者」？又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台灣民族主義者」？我基本上認為，在一九四九年——史明結束其「抗日」志業而從中國搭船返台的那年——以前，他似乎還未發展出明確的民族認同，而是以某種素樸的「社會正義」想法，當作他投入革命事業的主要理由。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由於對前一階段的中國經驗進行反省，老先生反而逐漸發展

15 此一語彙是由張智程所提出來的，見張智程(二〇一二)，〈開啟「史明學(Subengology)」研究的目的與意義〉，下載日期：二〇一三年一月十日，<http://blog.foodo.com/authorahope/archives/21259502.html>。

16 吳明勇，〈戰後台灣史學的「台灣民族論」：以史明為例〉(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四)。

17 徐致鈞，〈階級與民族之間：史明的馬克思主義民族觀〉(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二〇一〇)。

18 吳叡人，〈啟示與召喚：「台灣人四百年史」的思想史定位〉，收於史明等著，余崇任、藍士博編，《實踐哲學：青年讀史明》(台北：台灣教授協會，二〇一二)，頁二十八—三十六。

出某種「台灣民族認同」出來，而成為一個最基進的台獨運動參與者。

一九四九年以前：成為一個「人」

史明為什麼會走上這條「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呢？他又為什麼會在一九四二年決定到中國去參與中國共產黨的「抗日」志業呢？如果我們依循上述「思想史」之思考方式的話，我們似乎就必須直接扣緊史明和「社會主義文獻」——特別是馬克思和史達林等重要理論家——的邂逅經驗。的確，老先生是在早稻田大學時期，第一次讀到了《共產黨宣言》，也由於日本同學的帶領，而參加了馬克思主義的秘密讀書會。但是，如果我們再進一步追問，他為什麼會對這樣的讀物、這樣的思想產生興趣的話，那麼，我們似乎還是必須從其生命史著手，探尋他之所以會「趨近」這些思想的緣由。在這樣的思考下，我覺得他傳記中所呈現出來的「人本主義」精神和「理想主義」色彩，可能會是解謎的兩條重要線索。

首先談老先生的「人本主義」精神。由於是長孫，史明和阿嬤的關係十分密切。阿嬤一直對他強調，做人要有正義感。「也常常說：『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做人要有志氣，不能輸人；但是自己要嚴，對別人要寬』」（第一章）。這樣的想法對史明有相當的影響，

他自己就認為，「在小時候影響我、比較好的東西，主要都來自於我阿嬤的教誨」（第一章）。就讀於建成小學校（一九二六—一九三二）和台北一中（一九三二—一九三六）時期，雖然在日常生活中沒有感覺到自己和日本同學的差別，但是，由於受到父親及其「台灣文化協會」同仁的影響，史明慢慢產生了「我們台灣人是第三國民」、「我是第三國民，我要反日」的意識（第二章）。然而，這個「差異」意識的背後，反映的反而是一種素樸的「反差異人本主義／普遍主義」思想：「當時我是想說：『如果你是一個人，那我也是一個人。雖然我是第三國民，但我跟你日本人一樣也是一個人』」（第二章）。這樣的想法在早稻田時期得到了更適當的灌漑，特別是透過對文學作品的閱讀：

「當時我更開始建立評斷小說好壞的標準。這個標準並不是以日常生活為依歸，即便小說中有反派、正派人物，我也不會因為角色的一些行為而有所好惡，基本上還是會看一些比較原則性的東西——主要就是 human、就是以人的觀點來看。所謂人的觀點，並不是叫你站在地主或者有錢人、窮人的觀點來看事情，那是在講普遍的人性、human being。……老實說，小說方面如果有系統地讀，那麼自己的思想也就會跟著轉變。我會進去社會主義的思想，一開始也是從人道主義開始的。」（第三章；重點為本文作者加上）

這個「人本主義」思想，也可以在老先生的「中國時期」（一九四二—一九四九）找到痕跡。一九四六年，自己要求要進入「解放區」工作的史明，被安排到河北張家口的聯合大學進修，並碰到不少在該校教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老師。史明對這些以蘇聯式詮釋為根本的馬克思主義頗有疑慮，開始想到最初早稻田秘密讀書會所讀到的「自由」、「平等」等觀念，也想到所謂的「人本主義」：「照我來看，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就是要恢復人性，人又不是菜頭，殺了那麼多人又要怎麼恢復人性呢？於是我在解放區聽他們講馬克思主義，就慢慢反感起來，覺得這些東西和我過去在日本讀到的馬克思主義都不太一樣，連帶的也對中共稍微改觀，發現他們的思想並非全都是好的」（第六章；重點為本文作者加上）。

除了「人本主義」精神，史明的傳記中也可以找到不少「理想主義」色彩的描述。首先，老先生在十八歲那年「偷跑」到日本求學的舉措，就顯現出他和一般人不太一樣的「浪漫」人生志向。在當時，當醫生是身為殖民地子民之台灣人知識分子最好的出路，但他卻因為怕母親強迫他去當醫生，所以在台北一中四年級時選擇「偷偷一個人到日本讀書」（第二章），而且還有意地選擇早稻田大學去就讀。他這樣解釋自己的這個抉擇：

「當時我自己的想法，覺得醫生主要應該是為了救人，大家當醫生卻為了賺錢、想要變成富翁，好像多是為了自己。我跟我阿母的衝突就是在這一點上。」（第一章）

「戰前日本的大學有官立大學和私立大學兩個系統，官立大學就是像東京大學那種一流的學校……大多數人去唸官立大學，圖的不外乎是做官僚，待不住的人就去當律師，離自由與民主思想比較遠……至於民間私立大學如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則大多遵循英國的想法，學風比較自由，有社會良心、有自由民主思想的知識份子，大多來自早稻田大學或慶應大學。一般來說，台灣的學生到日本留學普遍對政治不感興趣，而我則是因為我阿爸的關係，加上我從小就看到《中央公論》、《文藝春秋》、《改造》等雜誌上面刊載很多早稻田教授的文章，所以在台灣的時候，就已經動念要到日本去讀早稻田大學的政治經濟科，到了日本以後更沒有改變這個志向。」（第三章；重點為本文作者加上）

在當時的日本，由於軍國主義的高漲，共產主義或無政府主義被視為是非法的東西，特別是在一九三七年的中日戰爭以後。即使是這樣，在進入早稻田的政治經濟科以後，老先生依舊透過大柴滋夫這位日本同學的帶領，而在一九四〇年時加入了馬克思主義的秘密讀

書會。為什麼會加入這樣的讀書會呢？某種素樸的「理想主義」，似乎和這個決定脫離不了關係：「雖然我對於馬克思主義、像一八四八年寫的那些〈共產黨宣言〉還是《資本論》等的瞭解，老實說仍然是初步的、很抽象的，但是一想到原來有這款『理想』的社會，全部的心神還是會被抓起來……」（第三章；重點為本文作者加上）。

而這種「浪漫主義」的高潮，或許就是史明於一九四二年到中國去「抗日」的決定。為什麼要到「中國」去？又為什麼要去「抗日」呢？是某種民族主義（特別是中國民族主義）的情懷嗎？當然，這個抉擇背後最簡單直接的理由，就是老先生所參與的這個秘密讀書會，以及同是讀書會成員之沈姓中共黨員私底下的邀請。但是，如果我們從更深層的心理層面來進行分析的話，史明所抱持的某種素樸「理想主義」情懷，似乎反而是理解此一抉擇的更適當方式。老先生這樣表示：

「一九三七年四月入學的我，本來是得到一九四三年的三月才會畢業，但卻提早到一九四二年的秋天畢業。這是因為太平洋戰爭爆發，我的日本同學們都要去當兵、去當敢死隊（神風特攻隊）。我有一位朝鮮籍的同學，因為朝鮮人比較早有服兵役的義務，

所以也和日本同學一起接受訓練。我看他們每個人談到死亡、陣亡時都表現得很坦然，一副很樂意為國犧牲的模樣，我卻因為是最後一屆不用服兵役的台灣人，而有一種失落的感覺，反覆思索著：『同樣都是年輕人，他們為了國家要去拼命，那麼我又要為什麼來拼命呢？』（第三章；重點為本文作者加上）

換句話說，當時的史明之所以會決定到中國去「抗日」，其最重要的思想資源並不是所謂的「中國民族主義」，而是「理想主義」或「馬克思主義」：「不如我就堅持我反帝國主義、反殖民地統治的理想，到中國、中共解放區那邊去參加抗日戰爭、實踐馬克思主義吧！」（第三章）。「人本主義」也好，「理想主義」也好，三十一歲以前的史明，正是透過這些思想的薰陶，而成了一個真正的「人」，雖然當時的他在民族認同上尚未明確成形。

一九四九年以後：成為一個「台灣人」

一九四九年，史明從中國逃回台灣；一九五二年，他又從台灣搭貨船偷渡到日本，從此亡命日本，邊包水餃邊思考自己的民族認同；一九六二年，資料蒐集與書稿撰寫達十年

之久的《台灣人四百年史》終告出版，堪稱是第一本以台灣人史觀來書寫台灣史的歷史著作；一九六七年，他集結島內外新舊地下同志，創立「獨立台灣會」，並提出「主戰場在島內」、「台灣民族主義」、以及「台灣社會主義」等號召。到底是怎麼樣的因緣際會，會讓曾經到中國「抗日」的老先生變成「台獨運動」最基進的一位參與者呢？下面就以這本傳記為素材，分別探討老先生在民族認同形成上三個可能的參照點——與「日本人」的關係、與「中國人」的關係、以及「台灣民族認同」的確立。

首先談史明與「日本人」的關係。當然，在一九四五年終戰以前，老先生在正式的國籍上當然是一個日本人。¹⁹然而，這裡的主要關切並不是正式的國籍，而是意識層面的國家認同或民族認同。史明在台灣讀過的兩所學校——建成小學校和台北一中，其學生組成都以日本人居多。以小學校為例，雖然台灣人學生的數目不多，「每一屆差不多三、四個而已」（第二章），但是，「那時台灣學生與日本人學生之間不太有互相看輕的情況，一桌坐兩人，大家要玩耍的時候也都是互相做夥」（第二章）。至於在台北一中時期，史明也都和日本同學玩在一起，「不過我這個人跟別的台灣仔不同款，說起來就是比較荒唐，我老愛跟他們那些日本孩子一起玩，踢球我就跟他們踢球，柔道我就跟他們柔道，沒感覺到有那款本島人與內地人的差別」（第二章）。在早稻田讀書的時候，學校風氣更是自由，「早

稻田大學的風氣也讓我嚇了一大跳，學校裡無論你是日本人、朝鮮人、台灣人，大家都是同學，不分你我。雖然當時我自己心中有那種『我是第三國人』的感覺，但實際上卻發現自己和別人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第三章）。整體來講，就日常生活經驗而言，老先生在求學時代並沒有感覺到什麼明顯的差別待遇或歧視。

但是，由於受到父親及其「台灣文化協會」同仁們的影響，也由於受到一些讀物的啟蒙，史明卻在「思想」的層次產生某種「反日」意識。

「我認為當時的我不是興事，而是因為我受到我阿爸他們那群台灣文化協會成員的影響，很早就有了『我們台灣人是第三國民』的意識，也因為讀了一些像《改造》、《中央公論》的雜誌，知道什麼叫民主、平等，雖然當時還不能夠被稱作是概念，但

19

史明在一九四二年抵達中國以後，曾經申請過所謂的「良民證」，所以在國籍上就成了「中國人」。然而，他卻似乎因為貪圖方便而未放棄自己的日本國籍，所以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這段時期應該算是同時具有「日本」和「中國」的雙重國籍。關於上述描述，口述史中的文字是這樣的：「拿了良民證，我的國籍就是中國人，本來我應該到日本領事館去宣佈放棄日本國籍，但是我想既然那麼容易就拿到中國國籍，所以也就沒有去辦這道手續。我在上海與蘇州之間往來主要就是靠這張良民證，不過查驗票的人看我外表就像日本人，往往會直接讓我過去」（第四章）。

隱隱然形成一種情感，我經常會想：『如果你是一個人，那我也是一個人。雖然我是第三國民，但我跟你日本人一樣也是一個人。』」（第二章）

「我自己在主觀上是反日的，總是叫他們日本人是『臭狗仔』，咱們台灣人是『第三國民』。不過實際上跟日本人同學做夥時，也沒有感覺他們對我們有什麼差別，即使我用所謂『臭狗仔』來形容那些日本人，在學校裡大家玩來玩去也是同款，讀書也同款，相打也同款，就在這個矛盾裡面成長。」（第二章）

換句話說，老先生與「日本人」之間，存在著的是一種矛盾複雜的感情。一方面，或許是出身世家的關係，史明在日常生活上感受不到太大的族群歧視，然而，在思想的層面，老先生卻透過抽象知識的學習而認知到「殖民地人民的悲哀」。因此，史明「這兩種情緒其實都是很抽象的一種感情，說不上有什麼很確定的信念」（第二章）。透過對上述這種「矛盾情緒」的解讀，我認為當時的史明雖然有著樸素的「台灣人認同」，但是，那種認同的核心其實是「追求日台平等」，並不見得是一種清楚的民族認同。

那麼，史明和「中國人」的關係又如何呢？老先生認為，由於台、中交流的斷絕，由於當

時到台灣的中國人多數都是以福州人為主的下階層人士，也由於阿嬤純樸的「反唐山」意識，赴日求學前的史明，至少在台北一中時期已經將中國完全視作是外國了（第二章）。之後，即使老先生在一九四二年決定到中國去跟隨中國共產黨抗日，其主要動機似乎也與「中國民族認同」無關，而是和「台灣人的第三國民身分」或「共產主義的實現」有關。他這樣表示：

「七七事變以後，中國變成了抗日的主要戰場，於是我想如果我想要把日本帝國主義從台灣排除，那麼似乎就必須到華北去抗日，也就是說，我會去中國，其實並不是為了漢族或者中華民族而去的，而是為了排除在台灣的日本帝國主義。」（第三章；重點為本文作者加上）

更重要的是，之後七年的中國經驗，似乎讓史明更進一步確認自己的「非中國人」身分。首先，當老先生還在上海從事地下情報工作的時候，有一天，他不小心在租界處踩到一個國人的腳。他雖然立刻就道歉，那個人卻得理不饒人，甚至立刻就在那裡嚷嚷起來。史明由於語言不通而聽不懂那人在說些什麼，而旁邊的人又馬上圍上來而將人行道擠得水洩不通。最後，老先生想起中國人都喜歡用錢來解決事情，所以就掏錢包拿給對方，事情才告結束。該事件發生後，史明向其同志轉述這個經驗，同志卻反過頭來說是他的不對，認為老先生不

該道歉而應該臭罵被他踩到腳的人。史明對同志的回答感到震驚，也第一次體驗到：

「我那時才體會到：人們的風俗習慣與倫理道德居然有那麼大的不同。當時在台灣與日本都一樣，如果遇到了類似的情況，一方就會說失禮、另一方就會說沒關係，我在上海時反而被對方抓得動彈不得、困窘不已，才知道在台灣的生活方式在中國簡直完全行不通。」（第四章；重點為本文作者加上）

此外，在一九四六年真正進入「解放區」工作以後，史明和中共的接觸越多，就越發現到中共無產階級革命的殘酷與獨裁。在所謂的「人民裁判」中，老先生親眼看到農民被迫拿刀將地主的頭砍掉，「刀一落，整個頭顱就裂開了，血跟白色的組織液都流了出來。等到第一個人下手了，剩下的人也就比較輕鬆，管它什麼刀拿起來就往地主的身上劃，到最後，就算地主沒有死，也是吊在架子上面直到斷氣」（第六章）。在看了這情景以後，「我……都沒辦法吃飯，有兩三天的時間躺在炕上動彈不得」（第六章）。

一九四七年，史明將國共內戰中被中共俘虜的台灣兵約兩百多名組成「台灣隊」，並擔任政治教員的工作。在訓練該隊的過程中，老先生發現到中共為了控制之便，著力於分化

台灣兵中的福佬人和客家人。史明這樣描述當時自己的心境：「分化政策是像清朝、日本人這些殖民者使用的步數，現在怎麼連革命部隊也在這樣子胡搞」（第六章）？在經歷過上述「中國經驗」以後，老先生決定：「再怎麼樣也要回到台灣，死也不可以死在中國」（第六章）！同時也用以下的敘述來總結自己的這段經歷：

「一九五二年我又到日本之後，重新閱讀第三國際的資料，才發現中共的統治方式，根本不是什麼馬克思主義，而是由史達林那邊傳過來的專制、獨裁的東西。」（第六章）

上述關於老先生與「日本人」和「中國人」之關係的描述，多數係來自於他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經驗。這段時期的史明，雖然在國籍上依序是「日本人」、「日本中國雙重國籍」、以及「中國人」，²⁰但是，根據傳記中的自我描述，老先生卻似乎不認同日本，也不認同中國，只是一味追求自己「反日」、「共產主義」的理想。他雖然並不否認自己的

20 不過，嚴格來講，一九四五年以後的史明，其正式身分應該是喪失了「日本」國籍，但是又欠缺任何正式的國籍身分吧！

「台灣人身分」，²¹然而，這個身分對他而言，似乎也只是某種樸素的「原鄉認同」或「土地認同」，似乎也還沒提升到「國家認同」或「民族認同」的層次。

那麼，史明又是在什麼時候發展出其「台灣認同」的呢？根據傳記的描述，老先生在中國時期「發現中共不是馬克思主義真信徒」的體認，似乎或多或少讓他產生了某種素樸的「台灣認同」：「我因為誤認中共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所以當年才會到中國去抗日。如今發現這個事實以後，才開始在計劃逃回台灣的過程中慢慢地浮現出『我是台灣人，死也要回到台灣』的想法、素樸的民族主義」（第十一章）。而在逃回台灣以後，又「看到國民黨在台灣的手段其實也跟中共毫無差別」（第十一章），才會進一步於一九五〇年決定成立「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

我會認為，這個「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的成立是理解史明「台灣認同」形成的重要線索。一方面，這個已經年過三十的「年輕人」依舊和之前的「中國抗日時期」一樣，充滿著熱情和理想；²²另一方面，史明似乎在「民族認同」上已經依稀發展出某種程度的「台灣意識」：

「我和周慶安兩個人對外宣傳時，都說台灣要獨立，要推翻中華民國。那時候，我說的比較白話，就跟他們說要去士林幹掉臭頭仔（蔣介石），大家聽了都會振奮起來。」

（第八章；重點為本文作者加上）

之後，隨著時間的變化，史明的「台灣認同」愈發強烈，也愈發明晰。前面已經簡述過，老先生在一九五二年偷渡到日本，一九六二年完成《台灣人四百年史》，一九六七年組織「獨立台灣會」，然後又於一九六八年和一九七五年兩次偷渡回台……。所以，接下來我們該問的，或許是相較於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社會主義者」身分，老先生為什麼會在一九九九年以後的這個階段變成「台灣民族主義者」，或者是「左派台灣民族主義者」呢？顯然，「社會主義」這個認同並未改變，改變了的是這個新增的「台灣民族認同」。為什麼呢？老先生在傳記中談到自己對其生命中之兩個「時期」的省思，一個是「後期中國時期」（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另一個則是「早期日本流亡時期」（一九五二—一九七〇）。在「中國時期」，老先生原本的信念是「唯有階級革命可以解決民族問題」，但是，此信念卻在目睹中國革命的實況後而告破滅：

21 比如說，老先生在日本讀書的時候，別人大多聽不出來他是台灣來的學生，「不過，我大多會在一開始便表明我是台灣人」（第三章）。至於在中國時期，「我在上海活動時並不諱言承認自己是台灣人」（第四章）。

22 老先生在傳記中這樣表示：「那時候的我，完全都沒有考慮到周圍的人，也沒有考慮到阿媽，少年時代的熱情和正義感，是我唯一的信念。那時我已經三十幾歲了，如果沒有夢、沒有理想，要想革命絕對是不可能的事」（第八章；重點為本文作者加上）。

「戰後等我進到解放區，看到毛澤東在華北罪及九族式地屠殺有國民黨背景的人——華北兩億人口中，被牽連的人總數將近一千萬人——又看到中共壓迫解放區的年輕人，逼得他們跳井自殺，才驚覺中共的手段與納粹沒有兩樣，毛澤東繼承的是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帝王思想與史達林的法西斯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第十一章）

因此，在一九五二年流亡日本以後，史明就開始重讀馬克思主義，因而修正了自己在前一階段所抱持的一些想法，特別是關於「階級」和「民族」之關係的想法。更具體地講，老先生認為，台灣的問題應該屬於「社會民主革命」，而不是「階級革命」：

「我在撰寫《台灣人四百年史》的同時，也重新閱讀馬克思主義等相關學說，並涉獵第一國際、第二國際或第三國際方面的知識，這些東西後來都被我發展成行動上的綱領。……不過我也沒有完全拷貝馬克思主義，我個人認為台灣應該屬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民族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的階級革命。」（第十四章）

「我希望大家記住一件事：殖民地必須先有民族的解放以後，才可能有民主。而台

灣如果沒有獨立，台灣人擁有的都是假民主。」（第十四章）

更進一步講，透過對台灣史的閱讀和書寫，史明終於高舉「台灣民族主義」的大旗，而在民族認同上完完全全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台灣人」：

「我是一直到一九五二年逃到日本、重讀台灣史以後，台灣民族主義的思想才逐漸明確。除了原住民外，我們的祖先雖然大多是從中國來的，但那是漢族、是『族群』，並非現代概念下的『民族』。清朝末年孫文提倡中華民族主義，當時台灣也不屬於中國的領土，不算是參與了中華民族主義的建構。我們雖然是漢人的後裔，但是四百年間台灣已有獨特的歷史演變……總之，我在一九六九年提出『反殖民地民族革命路線』的口號，是因為意識到我們必須先有自由、解放的民族，才能有自立、現代的社會——一九六〇年代亞洲幾乎都沒有殖民地了，印度、印尼、菲律賓、安南、緬甸，甚至太平洋上面隨便一個小島都獨立了，只剩下台灣還沒有獨立。……這句口號更非隨便喊出來的，它和我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有密切的關係，也是結合歷史學與社會學的成果。」（第十四章）

這本傳記的誕生，說起來很偶然，卻也有其必然。二〇〇五年三月，中國通過所謂的〈反分裂國家法〉，明訂在三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當時已經八十七歲的史明，為了抗議中國此一擴張主義的舉措，遂於台大校門口發起十四天的「反反分裂法」靜坐活動。也因為這樣一個機緣，有感於老先生所說的「只有講話是沒有辦法改變現實的」，已經停社一段時間的台大「濁水溪社」又正式回復運作。²³二〇〇九年九月，老先生在東京因為腎臟衰竭，一度昏迷了好幾天，住進加護病房，醫生還發出病危通知。同年十二月，身體狀況比較好轉的史明，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死也要死在台灣」，因此在十二月十七日撐著重病衰弱的身軀搭機回到台灣。²⁴

以台大「濁水溪社」為中心的一群青年朋友，也在藍士博的號召下組成「史明口述史訪談小組」，「在沒有任何學術機構支援下進行的總數三十次、超過一百二十小時的訪問」，²⁵這就是這本口述史的由來。

我說這本傳記有其偶然，是因為上述的故事——反反分裂法、濁水溪社、腎臟衰竭、口

述史——似乎並沒有一定要被連結起來的必然性。然而，透過老先生堅強的「台灣民族主義」理念，這些事件，卻也好像是那樣順理成章地被扣連了起來……。

結語

對我而言，史明之故事最重大的啟示，可能莫過於「先成為人，再成為台灣人」的這個過程。老先生曾經認為，「階級革命」可以解決「民族問題」，所以對自己的民族認同，並不是太在意，甚至可以為了這樣的信念而到中國去從事地下情報工作，並實際參與所謂「解放區」的游擊戰。然而，這樣的一位紅色戰士，到最後卻投入了「台灣民族主義」的懷抱，決意要為之生，為之死。

23 余崇任，〈序言〉，收於史明等著，余崇任、藍士博編，《實踐哲學：青年讀史明》（台北：台灣教授協會，二〇一二年）。

24 政治中心（二〇〇九），〈在東京傳病危 史明：死也要死在台灣〉，下載日期：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http://news.cts.com.tw/news/politics/200912/200912170366763.html>。

25 藍士博（二〇一二年），〈史明學（Subangology）的開拓與底蘊〉，下載日期：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日，<http://blog.roodo.com/aurorahope/archives/21191016.html>。

最後，我願意用一段被置於美國學者 Douglas H. Mendel 所著之《台灣民族主義的政治》最前頁的一首歌，²⁶ 來獻給史明老先生。很多年前，當我在雪城大學的圖書館中找到這樣一本談福爾摩沙島國的書籍，同時又看到這段文字時，那種震撼和感動，至今還歷歷在目……。

To dream the impossible dream

To fight the unbearable foe

To bear with unbearable sorrow

To run where the brave dare not go

To right the unrightable wrong

To love pure and chaste from afar,

To try when your arms are too weary

To reach the unreachable star

—— Joe Darion²⁷

27 26

Douglas H. Mendel, *The Politics of Formosan Nationali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該書標題為〈不可能的夢〉(The Impossible Dream) 的歌曲，是發表於1965年之百老匯歌舞劇《夢幻騎士》(*Man of La Mancha*) 的主題曲。而這齣歌舞劇的原著，正是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鼎鼎大名的著作《唐吉訶德》。見 Wikipedia (2012), "Man of La Mancha." Date visited: December 16, 2012,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n_of_La_Mancha.